



如何认识中医学学术流派

在未具体讨论中医学学术流派之前,先明确学派的本质是必要的。学派即一门学问中由于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。学派的关键是师承,没有师承就无学派可言。笔者认为中医学学术流派应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,第一,应有一个有影响的、著有一部或数部传世之作的学术带头人,即宗师;第二,有一个或一批跟随宗师的弟子(或亲炙,或私淑),他们在继承宗师的基础上有新的认识和发挥,其本身必须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,对后世的学术发展曾作出一定的贡献。上述这两方面的内容是相互联系,彼此不可分割,舍去其中一点,则难以形成学派。

“伤寒学派”中庞安时、朱肱、成无己、方有执、柯琴等诸位医家,对于《伤寒论》的研究虽有一定的成就,但他们之间不仅没有师承的关系,而且在学术渊源上也没有什么联系,其研究的内容、方法也各不相同。如庞安时治伤寒“主要是从病因、发病入手”;朱肱是“从经络立论”,着重探讨“六经方证的定位与定性问题”;成无己则是全面注释《伤寒论》,并对《伤寒论》中五十个主要症状作了精辟的辨析。可见,伤寒学派之说难以成立。

易水学派是以张元素为鼻祖,李杲、王好古为其入室弟子。他们均把脏腑证候的病机和治疗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,为丰富和发展脏腑辨证学说,对内伤杂病中气血虚损诸证之治法、用药等方面,作出了重大的建树。特别是李杲,他在张元素“脏腑论病”的启示下,对脾胃学说发挥尤多,对后世医学的影响更为深远。因此,易水学派的提出是令人信服的。

“温补学派”诸医家,如薛己、张介宾、李中梓等,他们在遥承易水学说的基础上,对脾、胃、肾与命门诸脏腑作了新的发挥,“温补学派”归属易水学派则较为妥当。

朱丹溪创相火、阳有余阴不足之说,倡异滋阴降火之法,似与河间学说注重外感六气化火、善用寒凉有别,但滋阴与泻火,对于火热病的治疗来说,都是必须的,只是根据火热病证候表现的不同而用药有所侧重,泻火利于保阴,滋阴利于降火,两者完全符合火热病的传变规律和治疗特点,说明丹溪学有渊源,他把河间学说研究的重点,从外感火热病机转向内伤

火热病机,从寒凉泻火转向滋阴降火,这是对河间学说的重大发展,朱丹溪不愧为刘完素的有作为的三传弟子,丹溪学派理应归宗于河间学派,没有另立门户的必要。

张从正对攻邪学说虽有颇多阐发,亦善用汗、吐、下三法,但“其法宗刘守真,用药多寒凉”。他在临床上习用的不少方剂如三圣散、茶调散、浚川散等,都是在河间学说的影响下所制定的,作为刘完素的私淑弟子,张从正亦应归属河间学派。

温病学说是在河间学说的影响下,后经过诸多医家的共同努力,逐步发展、趋向成熟起来的。刘完素为温病学说的奠基人素为人知,明、清时期的医家,如吴有性、余霖、叶桂等,虽对温病学说作出了各自的贡献,但他们既无师承关系,其研究的对象、范围、所用方药等也各不相同,如吴有性提出温疫的病因是“异气”,创邪伏募原之说,重温疫辨治;余霖创疫邪留胃,布散十二经之说,重疫疹辨治;叶桂创卫气营血辨证方法等等。因此,没有具备形成学派的必要条件,温病学派的提出,也就令人难以相信。

总之,中医学学术流派只有河间学派和易水学派,其他学派实属牵强。

为什么会出现伤寒、温病、温补、攻邪等如此众多本不存在的学派?其主要原因是混淆了学派与学说的概念,人为地扩大了学派划分的随意性,把一些医家对中医某一专门学说的见解和所作的成就,与学派的概念等同起来,从逻辑上来说,这是站不住脚的。

安徽医学院 徐国经

谈中医学派的划分

对于历史上的中医学派之分,可谓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个人认为,这种情况的出现,主要是忽视了学派形成的客观规律。实际上,学派的形成需有一定的基础,学派的存在又具有固有的特征。因此,对于学派的划分,也应当以此为依据。今作一浅析,与同道共同讨论。

学说与师承是学派形成的共同基础,但首先是新学说的提出。历史上有不少医家,颇具声望,且多收有弟子、门人,然可称学派者,却寥寥无几。究其原因,主要是仅有个人经验,而未能提出新的学说。可见,无新学说的出现,即无新学派的产生。

但是,新学说出现之后,并不一定形成新学派。学派的“派”,乃指派别,派别需要有一定的人数,个人不成“派”。所以,一种新学说出现之后,必需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、附和,这部分人主要体现在师承关系上。他们以新学说为中心,遵其理,循其法,逐渐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,于是才可称之为学派。

任何派别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,历史上的革新派是相对守旧派而言,主战派是相对主和派而言。中医学派同样如此,唯有不同的学术观点,才会有派别之分。而中医学又是一门内容极为丰富的学科,各医家因研究的侧重面不同,提出的学说内容亦不同。故划分学派时,不可笼统地对待,应注意学说的相对性,即同一主题范围内的不同观点。有此前提,才有划分学派的可能。

根据以上两点,可以认为,中医学派应划为河间学派、易水学派和丹溪学派三家。

河间、易水两派开山,刘完素与张元素皆今河北人,又处同一时期,两人学说均以病机为议论中心,但观点有根本的不同。刘完素在五运六气方面,着重阐述“亢则害,承乃制”,强调火热为病,主用寒凉。张元素则注重五运六气盛衰变化对疾病的影响,以寒热虚实论脏腑病机,喜用温补养正之方。此种分歧,下传弟子,俨然形成两大派别,这在元好问《伤寒会要》序中已有提示。

朱震亨与刘完素虽有师承关系,所提出的“阳有余阴不足”论,中心议题亦是探讨发病机理,但内容与河间学说有很大差异。河间论病因,以五运六气之理,阐发火热为患,注重外因;丹溪则参以理学思想,说明相火妄动之害,强调内因。河间火热论,多指实火,治用寒凉之品泻之;丹溪相火论,乃指虚火,治用滋阴之品补之。丹溪对从正的攻邪论持有异议,认为“攻击宜详审,正气须保护”。所创滋阴降火的具体疗法,已不囿于完素一类方药,而是参考诸家,甚至易水学派之说。如擅用应用的四物汤,乃《局方》所载;又常以生地、黄柏相伍,则参东垣之说。故后人评价丹溪乃集诸家之大成,并认为河间学说至丹溪已大变矣。随丹溪之学者,不乏其人。足见丹溪学派确实存在。有人将丹溪归入河间学派,系过于强调师承。事实上,师承关系并不能约制新学派的产生,后学者经过自己经验的总结,一旦提出新的学说,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另成门户而产生新的学派。丹溪正是如此。

张从正擅长运用汗、吐、下三法,但学术观点未脱却刘完素。如及倡言“三消当从火断”说,均是河间火热论的继续发展。诸所诊治,大部分以完素所拟方

药为基础。主攻论实际上是对完素学说在治则方面的具体补充。故不宜将从正于河间学派中分离出来而另设攻邪学派。

李杲为张元素的人室弟子。元素于疾病的论治,颇重视脾胃。他根据脾喜温运,胃宜润降的特点,总结出一套治疗脾胃病证的方法,确定了治脾宜守、宜补、宜升,治胃宜和、宜攻、宜降等治则。李杲脾胃学说确有创新,但溯其渊源,实是在元素的学术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,观点仍与元素保持一致,两者相比,显示不出学说的相对性。李杲归属易水学派,当无疑。

至于另外提出的一些学派,如伤寒学派,是把一些研究、阐发张仲景《伤寒论》的医家归伍而成,这仅是从专题研究的角度划分学派,无形中扩大了学派的界限,医经学派、经方学派也是这样提出的。倘若依此类推,则注重《本草经》研究者,可称“本草经学派”,注重《脉经》研究者,又为“脉经学派”,显而易见,这是不能成立的。况且,历史上不少医家对《内经》和《伤寒论》均有所研究和发挥,如黄元御撰有《伤寒悬解》和《素灵微蕴》,张志聪撰有《伤寒论宗印》、《素问集注》和《灵枢集注》,现将黄元御归入伤寒学派,将张志聪归入医经学派,恐失之片面。而研究《伤寒论》者之间围绕错简重订论与风寒中伤营卫之说的争论,是对《伤寒论》中某些问题的不同认识,与学说不可混为一谈。学说指的是学术上自成系统的主张、理论,两者有本质的区别。

明代医家薛己、赵献可、张介宾、李中梓等,提出的学说内容,除论脾胃之外,更多涉及肾与命门,他们的特点是汲取诸家之长,学术观点与治疗方法与易水学派显著不同,不可归于易水学派。而他们之间又无师承关系,冠以温补学派或折衷学派,甚或各自立派,均非所宜。

明末吴有性以后的温病学家,系统阐述了外感温热病的病因,传变途径及辨治方法,创立了温病学说。这些医家虽受河间学说的影响,但温病学说与河间学说的中心议题不一,故总究不属河间学派。且温病学说形成之后,得到普遍公认,无不同观点的学说出现,自然也无派别之分,则温病学派不能孤立地存在。

此外,所谓服古、叛经、汇通等,是某一时期的学术思潮,不可与学派同议。

综上所述,历史上的中医学派只有河间、易水、丹溪三家,其他种种,或缺乏学派形成的基础,或显示不出学派存在的特征,故均不能划定为学派。